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二十九辑(2010年第3期)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黄少安 / 主编

权力演化与国家竞争：一个基于国家间交易成本的考察

杜凯 周勤 汪建

分工演进、交易效率与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变迁

郭梅亮 徐璋勇

一人公司的经济学解释

高明华 柯希嘉

犯罪率的增长及其差异：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和保障的视角

郑筱婷 蓝宝江

破产受偿规则、债权人利益冲突以及经济学解决方法

江清云

地方政府短视偏差、行政拖延与锁定强制

叶德珠

——“一票否决”考核制度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地方官员行为与经济发展：一个基于政治晋升、财政分权与腐败的文献综述

郭广珍

中东经济落后的制度原因：一个历史视角

蒂姆·古兰 张清津 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二十九辑 (2010 年第 3 期)

黄少安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二十九辑, 2010 年第 3 期/黄少安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058 - 9814 - 1

I. ①制… II. ①黄… III. ①新制度经济学 - 文集
IV. ①F091. 34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2466 号

责任编辑: 吕 萍 程晓云

责任校对: 远瑞华

版式设计: 代小卫

技术编辑: 邱 天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二十九辑 (2010 年第 3 期)

黄少安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汉德鼎印刷厂印刷

永胜装订厂装订

787×1092 16 开 16.5 印张 300000 字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9814 - 1 定价: 3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制度经济学研究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主 编	黄少安
学术委员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林毅夫	世界银行
茅于軾	中国社会科学院
盛 洪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中心)
史晋川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张 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邹恒甫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
编辑部主任	李增刚
主 办 单 位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目 录

权力演化与国家竞争：一个基于国家间交易

成本的考察 杜 凯 周 勤 汪 建 (1)

分工演进、交易效率与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

组织变迁 郭梅亮 徐璋勇 (33)

超边际分析视角下的中国土地发展权与征地效率

——基于效率与公正的内洽假设 李子明 周群力 (53)

工人权利受损原因的产权经济学分析 于桂兰 郑秀芝 (76)

中国地区经济的收敛性分析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王 珏 宋文飞 韩先锋 (93)

一人公司的经济学解释 高明华 柯希嘉 (106)

犯罪率的增长及其差异：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和
保障的视角

——基于中国 1998 ~ 2006 年省际面板数据的
实证研究 郑筱婷 蓝宝江 (117)

法律保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省面板 数据的证据	李春涛 薛 奕 张 璇 (139)
破产受偿规则、债权人利益冲突以及经济学 解决方法	江清云 (153)
三峡外迁农村移民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山东省广饶县移民安置点为例	李增刚 夏永侠 (169)
地方政府短视偏差、行政拖延与锁定强制 ——“一票否决”考核制度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叶德珠 (187)
长期增长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宏观总评述	周 炎 陈昆亭 (197)
地方官员行为与经济发展：一个基于政治 晋升、财政分权与腐败的文献综述	郭广珍 (216)
中东经济落后的制度原因：一个 历史视角	蒂姆·古兰 张清津 译 (230)
2010 年制度经济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244)
后记	(254)

CONTENTS

Evolution of Power and National Competition: An Investigation on Transaction Costs among Countries	Du Kai Zhou Qin Wang Jian (32)
The Division of Labor Evolution, Transaction Efficiency and China's Rural Inform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 Changes	Guo Meiliang Xu Zhangyong (52)
Inframarginal Analysis on Chinese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and Land Expropriation's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Internal Coherence of Efficiency and Justice	Li Ziming Zhou Qunli (74)
Property Rights Economical Analysis on the Workers' Rights Voilation	Yu Guilan Zheng Xiuzhi (92)
Convergence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ang Jue Song Wenfei Han Xianfeng (105)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One-Man Company	Gao Minghua Ke Xijia (116)
The Effect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Support and Constraints on Crime Rate: An Empirical Study	Zheng Xiaoting Lan Baojiang (138)
Leg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s Cross Provincial Level Panel Data	Li Chuntao Xue Yi Zhang Xuan (152)

- Satisfaction Rules, Interest Conflict of Creditors
and Economic Solutions **Jiang Qingyun** (168)
- Research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Rural
Relocated Immigrants—Take the City Guangrao of
Shandong Province As a Case **Li Zenggang Xia Yongxia** (186)
- Local Government's Myopia Bias, Administration Delay and
Commitment Enforcement
—The Behavior Economics Analysis on the Administrative
Assessment System of One Ballot Veto **Ye Dezhu** (196)
- A General Comment on Long Run Growth and the
One-child Policy in China **Zhou Yan Chen Kunting** (215)
-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Literature Review Based on Political Promoti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Corruption Perspective
..... **Guo Guangzhen** (229)

权力演化与国家竞争：一个基于国家间交易成本的考察^{*}

杜 凯 周 勤 汪 建^{**}

【摘 要】本文在国家竞争与交易成本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命题：制度设计的双向效应、经济增长的双重机制，以及国家竞争的本质。制度设计的双向效应是指从协作和竞争的视角来看，现实中既有旨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设计，也有旨在提升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技术不仅是一种增长要素，更是一种竞争要素，这就造就了经济增长的双重机制：产出的绝对增长和竞争抑制下的相对增长。权力是国家竞争的本质，技术的制度属性是国家竞争权力的来源。国家在权力的基础上实现交易成本的分配，“自然选择”的演化过程决定了权力本身是路径依赖的，因此国家间交易成本必然向权力派生的成本收敛。本文为拓展经济增长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关键词】国家竞争 权力 交易成本 演化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A

一、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制度通常被认为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提升交易效益而产生的，但是如果上升到国家竞争的层面来看，往往存在大量与上述目的相悖的制度设计。本文的重点并非探讨那些国家竞争中的双赢制度，而是旨在探究一种最大化自我利益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往往并非带来交易成本的降低，然而却长期存在，并成为所有参与贸易国家都遵循的一种路径依赖。更为重要的

^{*} 本文获得2010年东南大学优秀博士基金支持。

^{**} 杜凯，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211189)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南大学橘5-104，E-mail: basca@163.com。周勤，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汪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是,这种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制度设计,对经济增长存在不可磨灭的贡献。对这个命题的考察,可能会帮助我们在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上找到新的方向。

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增长就成为最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正如卢卡斯(Lucas, 1988)所说,“一旦我们开始思考‘经济增长’,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了。”亚当·斯密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对贸易缘起以及一国财富积累和增长问题的研究开启了经济增长理论体系的大门。随后,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以及穆勒等学者继承并发扬了斯密的观点,构建了古典经济学派,强调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古典学派另外一个巨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国际贸易分析框架,例如斯密用“绝对优势”理论解释了贸易的缘起与发展,而李嘉图则用“比较优势”初步回答了:为什么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穷国)与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富国)仍然可以进行贸易往来。随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出现,使得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一次彻底的革命。其中,对国际贸易理论贡献最大的当属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H-O模型,他们认为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要素价格也有均等化的趋势。H-O模型的一个很重要假设条件就是技术水平不变,因此对这个假设的修正也恰巧是罗伯特的贡献之处。索洛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并非仅仅依靠资本和劳动力,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索洛余值)。这一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迅速得到认同,并且促使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从传统要素转向技术要素领域。在这种趋势下,新经济增长理论(又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出现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向传统经济学派提出了几个问题:(1)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长期的经济增长?(2)为什么一国可以成为技术领先国?(3)后发优势是否可以造就落后国家向发达经济实现收敛?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大量的内生增长理论的学者做了大量的尝试和回答,如克鲁格曼(Krugman, 1979)、罗默(Romer, 1987)、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 Helpman 1991)、巴罗和马丁(Barro & Sala-i-Martin, 1992)等。他们认为技术创新是决定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低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以尼尔森(Nelson, 2002)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派的认同,即技术创新是一国经济增长乃至国家之间竞争的核心驱动力。但是,演化经济学派的产生要得益于制度学派的贡献,后者为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新的观点。

制度经济学派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左右,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派,他们强调非市场因素诸如制度、法律、历史、社会和伦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科斯、威廉姆森和诺思为代表的学者创立并发展了新制度经济学派,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以及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其中,科斯的最大贡献在于使经济学从零交易费用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费用的现

实世界。在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又以诺思的贡献最大。诺思认为，新古典理论并非是一个分析经济增长政策和制度的有效工具，同时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的技术发展以及内生增长理论中的人力资本投资都忽视了制度中的激励结构。诺思甚至毫不留情地对新古典理论和内生增长学派提出批判：

“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假设主要有：1. 完全竞争市场；2. 无成本地执行产权；3. 中立的政府；4. 恒定的偏好水平……新古典的理论假设在现今已经无法准确地把握现代经济问题的本质，不仅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大量的经济决策也是由市场以外的因素如家庭、企业、贸易联盟和政府做出的；交易成本并非为零；政府支出规模在不断扩大，通过政治决策来解决经济问题也是无处不在；意识形态也改变了决策选择的容忍范围（North, 1978）。”

“一些文献研究了资本存量、技术、R&D、储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看起来制度似乎是不起作用的……这些研究暗含的一个假设就是，激励机制不影响经济绩效或者不同国家的激励机制是相同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成功的经济增长只与人力资本投资、物质资本、储蓄甚至是人口增长率的降低有关，似乎与经济体的博弈规则没有任何关系。”诺思（North, 1993）甚至指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这些因素本身就是经济增长而非经济增长的原因（North & Thomas, 1973）”。

究竟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的技术进步决定了长期经济增长，还是制度学派中所强调的制度发挥了根本作用？我们或许可以在演化经济学派中找到些许启示。近些年来，演化经济观点逐渐地重回经济学家们的视线内，这种变化主要源于新古典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竞争中的非均衡现象，尤其是技术变迁推动下的经济增长和创新竞争理论。不论是新古典理论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都很难将竞争的动态过程理论化（R. Nelson & K. Nelson, 2002）。而制度经济学派则更多地倾向于制度本身，即认为一国的制度结构决定了掌握和创造新技术的能力，即制度决定经济绩效。对于制度经济学派来说，他们也并未将技术和技术变迁准确地纳入到制度分析中去（Nelson & Winter, 2002）。演化经济学派坚持了内生增长理论的观点，即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乃至国家竞争最核心的要素。但是，演化经济学派同时强调制度变迁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即技术和结构是共同演变的（Co-evolution）。尼尔森等（R. Nelson & K. Nelson, 2002）揭示了技术与制度这种共同演变的过程：

“生产技术的创新是增长的驱动力，新制度的产生源于交易模式的变化——新的组织运转方式、新的市场模式、新的法律、新的集体行为准

则——都导致了更多的新制度产生于经济体系中。生产技术与社会技术（制度）的作用是相互的，新的制度安排会导致新技术的出现，这些新技术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首要因素；随着技术创新的加快，新技术的产生又会产生新制度的需求，并进一步促进了制度变迁。”

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问题存在争论，但是在技术和制度领域来解释经济增长至少是一个共识。新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通过构造大量的内生增长模型将技术变迁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贫穷国家通过模仿和学习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制度经济学派则强调制度决定经济绩效的根本性作用，制度是人为设计的约束，这些约束构成了人类的交易基础。制度由正式约束（例如规则、法律和惯例等等）和非正式约束（行为规范、公约、自我施加的行为准则等），以及这些约束的执行特征。它们共同决定了社会（尤其是）经济的激励结构，决定了技术水平与劳动要素的收益率（North, 1994）。演化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和技术的变迁本身是一个共同演化的过程，二者彼此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因此，演化经济学的观点更多的是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一种糅合。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传统的横向商品贸易已经被全球纵向分工模式所取代，经济增长的范畴已经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产出增长。我们可以推测，如果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之间存在彼此融合的趋势，那么这种融合能力必然演化出国家竞争命题。因此，本文在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的双向效应和经济增长的双重机制，并提供一种有关国家竞争和国别间交易成本的新的思辨。

二、制度设计的双向效应：降低还是提升交易成本？

（一）对制度经济学观点的几点提炼

旧制度经济学派如凡勃伦（Veblen, 1898）将制度定义为“行为和思想的普遍习惯”，而新制度经济学派则更倾向于“博弈规则”的定义方式。在经济学发展的今天来看，制度学派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似乎得到了更多的支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现代生产率的增长源于技术的发展以及科学与技术的融合，是知识存（流）量的根本性变化所导致的，但这一切都依赖于人类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彻底变革。长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经济博弈的规则，正是制度定义和执行了这些经济规则，因而也就显著地决定了经

济绩效 (North, 199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更多地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并验证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阿塞姆格鲁等 (Acemoglu, Johnson & Robinson, 2001; 2002a; 2002b) 很好地填补了制度经济学派在实证研究领域的空白。他们用大西洋贸易、世界范围内殖民试验,以及民主与专制研究,从数理和计量的角度验证了制度才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并且是造成近 500 年来世界范围内出现国家衰落与兴起的主要原因,对制度学派研究方法的创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阿塞姆格鲁等 (Acemoglu, et al., 2004) 进一步指出,有些国家之所以比其他国家贫穷的缘故,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实施了较差的经济制度所导致的。

制度是如何实现变迁的?从根本上来说,制度变迁的激发因子就是源于对利润最大化的渴望 (North, 1970)。导致产品和要素市场效率提升的历史源泉主要在于制度设计的不断发展。因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往往是两个独立的过程,新技术的出现往往会造成经济的不均衡,正是这种不均衡才导致制度的创新变得有利可图 (North, 1971)。戴维斯和诺思 (Davis & North, 1970) 对此进一步做出了解释,制度创新,或者说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一定是由一个行为群体 (an action group) 做出的决策并且予以执行。如果新的制度安排是成功的,那么这个行为群体会持续地从制度创新中获得一部分收益 (诺思后来对此补充说,这部分收益可能是潜在的),这部分收益同时也会为更新的制度安排提供基础。它们同时也需要至少承担一部分创新的成本,但可能并不一定需要支付新制度的运行成本。诺思进一步认为,一个成功的政治或经济系统一定是孕育了一种柔性的制度结构 (flexibl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从而可以有效地减少制度演化带来的冲击和部分变化。但是,这些系统是一个长期酝酿的产物。正如诺思自己所说,“我们并不知道如何短期内创造适应性效率 (adaptive efficiency)”。

如果说制度在长期内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绩效,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制度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随着经济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各国在不同的制度水平下又是如何实现协作的?制度水平的差异会造成交易中的冲突因素,并进一步导致国家间交易成本的出现。如何鉴别这些国家竞争中的交易成本的属性呢?

(二) 交易成本的耗散与非耗散

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条件下,市场价格可以传递准确的信号,帮助交易双方确定决策和行为。但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存在。多数学者认为,科斯 (Coase, 1960) 在制度、交易成本和新古典理论的衔接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进一步推动了交易成本经济学 (Transaction

Costs Economics, TCE) 的发展。事实上早在 1937 年, 科斯就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 市场中的交易其实是要耗费大量成本的, 这包括搜寻交易对象、讨价还价、契约的订立、契约的监督执行、维护交易秩序、解决交易纠纷以及对违约行为的惩罚等。因此, 科斯进一步指出, 应该采用交易成本较低的契约形式来解决交易中的种种费用。然而, 契约的建立本身也是有成本的,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只有低质量的商品会被交易 (Akerlof, 1970)。威廉姆森 (Williamson, 1985) 则进一步补充到, 即使交易双方彼此都掌握了完全的信息, 不确定性仍然会造成契约的失效。不确定性因素越多, 那么事前的预期和对契约的适应性就越难。由此可见, 契约的建立必然要付出成本, 由于契约形式的多样性, 达成不同的契约形式会耗费不同量的交易费用。在现实中的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 订立的契约也是不完全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以及资产专用性的一系列因素, 契约反而会产生新的经济纠纷。因此, 比特利斯 (2002) 预言 (TCE) 是经济学中一个最重要的发展领域, 主要原因在于它弱化了经济学中迄今流行的假设: 人们分析经济或经济问题时, 忽略了交易成本。

大多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 一项好的制度设计应该是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交易效率的, 减少交易成本会增加消费者的福利 (Jarillo, 1988; Williamson, 2002)。威廉姆森 (Williamson, 1981) 曾对厂商演变做了这样的诠释: 厂商采用纵向一体化、M 型组织、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等战略或演进发展的目的是在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因此, 大多数人都会持有这样一种观点, 交易成本是耗散性的, 制度的产生和变迁往往都是遵循降低交易成本方向而延展的。我们往往很少去思考, 为什么那些旨在提高交易成本的制度会得以维系, 或者说制度变迁的方向反而是以增加交易成本为目的的。交易成本并非都是耗散性的, 这个观点是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突破。例如在微观经济层面上, 罗内和麦金尼 (Ronen & Mckinney, 1970) 提出的转移定价模型表明, 供应商和客户达成合作协议, 使其共同利益最大化是可行的。但这一过程将 “提高集中记账和信息传输的成本”。但是这些交易成本并非全部是耗散性的, 至少它给交易双方都带来了正效益。布罗伊斯 (Blois, 1990) 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并且通过转移定价模型证明了存在交易成本的增加会同时促进生产商和消费者收益的情况。由此可见, 提高交易成本反而可能对交易双方都有利。瓦利斯和诺思 (Wallis & North, 1988) 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他们指出交易部门的增长主要源于交易中介服务的扩张, 这一事实掩盖了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一个共同的错误观念: 即交易成本必然不产生效益。这一观点改变了以往对交易成本的看法, 即认为交易成本的存在必然导致经济效率的降低, 因此制度和组织结构变迁的目的都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交易成本并非都是耗散性的

观点，更多的是从微观经济学中个人与组织的视角来考察的，如果把这个观点上升为国家层面中去，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一种对制度的新的认识^①。

事实上，一项制度的产生往往是具有双向效应的：它既可能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设计的，也有可能是为了提升交易成本而安排的。正如布坎南（Buchanan，1989）所指出的，为了促进政治的发展，必须改进或改变规则（制度），因为这些规则决定了政治的博弈。我们通常所说，一些无效的制度会提升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效率。然而，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制度设计，并且是长期被维持的，尽管它们的意图是为了提高交易成本。同时，正是这个意图造就了制度的双向效应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疑问：导致交易成本增加的制度设计，为什么能够存在？用比特林斯（2002）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人类会用存在正交易成本的世界来取代零交易成本的世界”。

（三）国家竞争视角中的制度和交易成本

迪克西特（1994）坦言，在所有受到交易成本制约的相互交往中，参与者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设计方法的——市场或非市场、政府或私人，通过这些方法可以降低那些交易成本，并且这些设计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与之相关联的制度。历史以及未来相互交往的可能持续时间等。制度决定了交易成本的类型，各国间制度水平的差异很可能会引起国别贸易中的巨额交易成本。因此在国别间贸易中，一国政府往往倾向于本国企业，并且在本国与外国企业之间实施了差别对待的政策。这些政策人为地提升了贸易成本，降低了贸易效率（Hennart，1989）。例如，梅耶尔（Meyer，2001）的研究指出，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制度变迁的过程往往都是不连续和不稳定的。跨国公司在选择进入这些转型国家的时候，不得不面临巨额的交易成本。跨国公司必须知道如何在转型国家利用市场机制进行合作与竞争，需要确认业务种类与商业伙伴的偏好、掌握评估需求和供给结构的能力，从而才能制定合适的价格。这些行为都增加了跨国公司的搜寻、谈判和签订契约的成本。同时，斯万（Swaan，1997）认为跨国公司在进入转型经济国家时还面临着不确定的政府管制，包括低效率的政府、不成熟的司法系统、知识产权保护欠缺以及腐败问题带来的交易成本。其他学者也同样对国别间交易成本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例如研究不同国家的交易成本变量如何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选择，即选择合资企业（JV）模式还是全资子公司模式

^① 正如韦森（2009）所强调的，对制度变迁和交易费用关系的研究，“也许会拓展出一个非常有理论发展前景和应用价值的研究空间或研究领域”。

(WOS), 以及国别间的交易成本是否会对贸易双方的投资决策都产生影响 (Hennart, 1991; Hennart & Jorma, 1998; Makino & Neupert, 2000 等)。研究结果发现, 国家间交易成本的大小例如东道国政府的限制、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战略性因素等, 对于不同国家 (例如美国和日本, 芬兰和日本) 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倾向都产生了不同的作用。这些文献都直接或间接证明了国家间交易成本的存在, 且对国别之间的经济活动产生显著影响。

在国际贸易中, 竞争与协作的关系是同时存在的, 这就意味着每一个贸易参与国之间不得不在制度的双向效应中进行选择: 是降低双边的交易成本, 还是提高双边的交易成本。从协作的关系来看, 由于协作给双方都带来了利益, 因此只要是参与到协作关系中的国家, 都具有降低彼此交易成本的动机。然而, 从竞争的视角来看, 不论是诺思还是迪克西特, 都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念, 我们不必为那些提升交易成本的制度设计而感到惊讶, 因为制度的设计往往都是基于自身利益的, 并且取决于参与制度设计的主体之间的博弈, 尤其是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框架之中。为了达到限制竞争对手的目的, 制度设计者并不一定会站在社会福利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角度去考虑。例如, 1914 年特别是 1930 年以来, 金本位制受到侵蚀, 已经使货币供给的名义上的依靠不复存在, 从而使限制价格水平变动的力量不复存在。因此, 竞争的利益集团操纵货币供给, 是现代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力量 (Barro, 1979)。这种货币操纵虽然给贸易各国都带来了耗散性的交易成本, 但是这种制度安排却是长期存在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单向机制。

三、重新审视经济增长: 制度效应下的双重机制

(一) 传统经济增长

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 通常是指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 (人均) 产出水平的持续增加。众多经济学文献都采用了 (人均) GDP 作为衡量一国经济产出水平的最重要参照, 重在考察产出能力的表现。的确, 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在既定制度框架内, 在一定技术水平下实现生产率的提升。制度分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政治制度意味着立法和代表性政府的建立, 经济制度主要包括稳定执行的产权制度可以使得经济组织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内建立契约关系。这些制度不仅仅为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发展创造了环境, 而且为促进生产率的交易活动提供了更高回报的激励机制 (North, 1993), 进而也就决定

了技术、劳动和资本要素的投资程度。诺思（North，1971）同时指出，导致产品和要素市场效率提升的历史源泉主要在于制度设计的不断发展。因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往往是两个独立的过程，因为新技术的出现往往会造成经济的不均衡，正是这种不均衡才导致制度的创新变得有利可图。

其实，制度作为一个人为设计的规则，其主要作用在于为交易提供一个契约订立的依据，并且在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约束下，降低交易成本，保证交易的顺利实施。如果各国家的经济体系都是封闭的，且彼此的制度水平不会对他国造成干扰，那么那些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的制度设计，对于本国来说就是成功和有效的。同时，当一国的制度阻碍了经济增长，这个国家往往就会缺乏充足的技术和资本，为什么呢？这种缺乏可能并非是由于技术信息和潜在储蓄不足所导致的，更有可能是“适宜”（right）的制度形式缺失所导致的，这种合适的制度意味着有利于新技术的吸收和生产性资本的形成（Wolf，1955）。由此可见，制度通常在各个国家都表现出与经济增长的一致性：即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往往能够促进本国产出的持续增加。然而，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和运输成本的下降，各国经济的联系比以往更加紧密，因此制度与经济增长的这种一致性可能会在更大的范围被表征出来。例如，一项良好的贸易制度安排会降低国与国之间的缔约和执行成本，减少贸易过程中的效率损失，最终结果是这项制度设计会给双方都带来产出的增加。如果这项具有效率的贸易制度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广和实施，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经济增长机制是具有普遍性的，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增长形式。

（二）交易成本约束下的相对增长

然而，在强调旨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会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那些虽然提升交易成本、但仍然存续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否则，只强调制度前者而回避制度后者，我们势必会陷入瓦利斯和诺思（Wallis & North，1988）所说的那个“共同的错误观念”。诺思（North，1993）断言，近150年由于科技进步带来生产率的增长，根源于制度变迁中的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的结合。所谓供给层面，主要是指制度和组织结构的根本变革；需求层面主要是指制度变迁诱发了社会中的紧张关系，这同时也在政治上激发了对制度结构进行变革进而来缓和这种紧张关系。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出，对于一个具有统一政治框架下的国家来说，如果一项新的制度设计提高了交易成本，那么这种制度变迁所诱发的紧张关系，并没有累积到足够激发对制度结构进行变革的程度。换句话说，这种制度设计所引致的交易成本有充足的渠道能够被交易双方所消化，或者被交易的收益所抵消。如果交易双方彼此上升为国家层面，例如竞争机制的存在，那么这种提升交易成